

年羹堯死因探微

陳捷先

清朝康熙、雍正年間，年羹堯是個顯赫一時的人物；尤其是雍正初元，清世宗對他時頒殊恩，賜爵、賜金、賜第、賜世職、賜佐領，真是寵幸得無以復加，完全做到了「千古君臣知遇的榜樣」，足可以「令天下後世欽慕流涎」。可是這種恩遇爲時不長，結果君臣之間發生了恩讎中變的憾事。年羹堯竟被認爲「罪蹟昭彰」，以致內外大臣「彈奏交至」，最後「案牘等邱山之積，罪惡踰谿壑之深」，年羹堯被判處了死刑。根據清朝官書的說法，年羹堯的罪狀實在多端，計有大逆罪五條，欺罔罪九條，僭越罪十六條，專擅罪六條，狂悖罪十三條，貪贓罪十八條，忌刻罪六條，殘忍罪四條，侵蝕罪十五條，總共九十二款。誠如年羹堯自己所說：「若是主子必要執法，臣的罪過不論那一條那一件，皆可問死罪而有餘的。」因此議政大臣等奏請把年羹堯「立正典刑，以申國法」。世宗爲了念及他在青海之役有功，「不忍」加以極刑，只令其自殺，以示寬仁（註一）。近代史家對於年羹堯的死則認爲主要的原因是他曾經幫助世宗「奪嗣」繼統，鳥盡弓藏，是必然之理；世宗終究要殺之以滅口，這也是中外歷史上常見的事（註二）。我個人以爲年羹堯的死因確實與他自己的「功」和皇帝的「恩」有關；但是還有其他方面的事實也是我們不能略忽的。如果能從心理與人性等方面來探究這個問題的話，也許我們對年羹堯的死更能了解真象，獲得更客觀的結論。

年羹堯原屬漢軍鑲白旗，是下五旗之一，與皇室的關係比較疏遠。康熙四十八年，清聖祖把他們一家撥屬於雍親王胤禩（就是後來的清世宗雍正皇帝）門下，從此胤禩和年家有了正式的主奴關係。（註三）按照清初八旗制度，旗主與屬人的關係是相當嚴格的，主子對奴僕有着絕對的權力；生殺典賞無所不能。可是年家與雍親王的情形似乎不能作如此觀，當時年羹堯初露角頭，不久就被聖祖擢陞爲四川巡撫，任職邊區，很少在京中走動；而羹堯的父親年遐齡已是退了休的官員，與雍親王

的接觸也不多。尤其到康熙五十六年以後，由於羹堯與其他皇子如允祉、允禩、允禩、允禩等人的交往不尋常，以致主僕間的感情一度瀕於破裂的邊緣。例如，羹堯曾接受允祉門下奔走人的饋贈，以致引起雍親王的惱怒，罵他無法無天，狂悖無忌（註四）。他又收取皇九子允禔派人送他的幾十個小荷包，與允禔一黨頗有聯絡（註五）。我們知道：當時正是康熙廢儲以後，諸皇子發動繼承鬥爭激烈的時候，年羹堯不爲主人効力，反而接受其他皇子的饋贈，實在有些反常。尤其他對主子胤禩竟然「終年無一字請安」，又不稱自己爲「奴才」，這些都是違反國家祖宗定制的，難怪胤禩對他的這種「逞一時剛愎之私」的「狂昧行爲」極表憎惡。康熙五十七年，皇十四子允禩受命爲撫遠大將軍，專任西征重務。年羹堯正在西陲服官，（允禩受命後不久年羹堯即被陞任四川總督），便對允禩處處迎逢，事事効力。羹堯與允禩之間的親密關係，更令胤禩不滿，連雍親王府的屬人後來都恐怕他們的勾結會生事，對雍親王的活動有不利影響（註六）。然而清世宗是個深沉精明的人，年羹堯既擁有重兵，很有利用價值，當然絕對不能與他對立的。所以在康熙六十年至六十一年間，胤禩和羹堯之間在京師或熱河等地方都有一些接觸，改善了不少關係（註七）。後來聖祖遽然賓天，胤禩入承大統，羹堯由若即若離的舊關係又與主子重拾舊好，世宗也利用他牽制允禩在西疆的大軍，使「口內口外，帖然安靜」；羹堯則出賣允禩以保全祿位，實收利益，他們主僕可謂各得其所（註八）。

雍正初年，世宗和年羹堯的關係從表面上看是逾越常規十分親暱的；但是世宗心中總不免對羹堯的勢利現實與反覆無常有所不齒，皇帝對他的信任當然也就不會全心全意的了。加上年羹堯的態度曖昧不明，和允禔等人的關係似乎還沒有完全斷絕。他除了同情並照顧允禔以外，並且和允禔還有「密封文書」來往的事（註九）。年羹堯對世宗的不顧手足之情，慘害諸弟的行爲似乎也不甚滿意。當年被世宗命令在湯山監視允禩的總兵官李如柏，後來到陝西在年羹堯麾下服務時，年羹堯就對他說：「你莫以十四貝子之事爲得意，你若在我這裏也想如此，我萬萬依不得。」連李如柏聽了也不禁要問：「年羹堯萬萬依不得者，是何主見？」後來年羹堯對李如柏又百般虐待，不准他支領薪餉，要他改行；不知道這是不是他爲允禩以前的受苦

受害而向李如柏施以報復？（註一〇）這些舊怨與新恨必然會使世宗對年羹堯產生不良印象，所以除了由四川巡撫蔡珽從旁調查年羹堯的一切以外，在雍正二年，世宗又派圖理琛等人到陝西，名義上是協助羹堯，實際上則為暗中監視其工作與行動。至於岳鍾琪早就被世宗攔絡，牽制羹堯兵權，則更足以表明皇帝對羹堯的不信任了。可是羹堯粗才，他不但不知檢點，反而做出很多僭越規制的事，使世宗與他之間的關係由信任而轉變為懷疑。

年羹堯的言行舉動實在大有問題，例如他征討青海叛亂時，他要蒙古無罪王公向他下跪。雍正二年去京城覲見皇帝的途中，他又要總督巡撫們跪迎他，這些都是僭妄的行為（註一一）。他還妄襲親王之例，給將軍督撫行文，擅用令諭，並且「用硃筆打直」，會見下屬，俱令「地下坐」，真是蔑視官常擅作威福之極（註一二）。雍正初元，延安府屬米脂等地逃荒的人很多，世宗特令蠲免正供。年羹堯在曉諭民衆的時候，不提這是皇帝的恩賜，只說是他個人出力所致；這種市恩於衆的行為也是他僭妄的另一例證（註一三）。至於年羹堯日常生活行動方面的驕奢，則更是可觀可怕。諸如他在西寧時「出入以土墊街，以水壓塵」，實屬過分，難怪後來被羅織為罪狀之一（註一四）。還有傳言說他用一頭豬僅作「小炒肉」一盤的事，更是說明他的浪費無度了（註一五）。

對於年羹堯的這些僭妄驕縱事實，世宗一定深惡痛絕，同時還可能聯想到他由功而驕的後果。這樣一個反覆無常、唯利是圖的人，他以前能出賣允禩來求取利祿，將來又何嘗不會對世宗自己有反目的一天？皇帝也知道功臣「若倚功造過，必致返恩為仇，此從來人情常有者。」世宗如果因此而對年羹堯不敢專信反生懷疑之心的話，我認為這應該是十分可能而且相當合理的。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第一點。

年羹堯自康熙以來，在幾次大事件中，他的表現是十分驚人的。平定西藏顯示了他的才智（註一六）；奪嗣鬭爭證實了他的軍力；征服青海更說明了他策略的有效與殘忍（註一七）。這些雖是他的優長之處；但也是他令人憂慮之處。尤其是對於一個猜忌如清世宗的君主，年羹堯的才智殘酷是會使他憂懼的。況且雍正以來，羹堯有些作風也頗令世宗不解，例如在川陝一

帶用人，年羹堯多就近題補，很少經過引見；而他考核各官都依照和他個人的關係親疏而定優劣，顯有植黨營私之嫌（註一八）。世宗最恨人結黨，特別是有權力的人結黨。此外年羹堯的貪婪也是有名的：題補官員要謝儀；捐納人員也要禮金；冒銷軍需；加收火耗；甚至喇嘛寺的財物都搶掠收受，所以年羹堯家的財物山積，稱富一方（註一九）。後來世宗發現他斂財的目的，全在「市恩於衆」，想「以此要結人心，蠱惑國事」，想來真是可怕。年羹堯家中又被查出私下收貯「鎖子甲」及「鉛子」，這些都是軍需禁品，非謀圖大逆的人不會收藏此類東西的。（註二〇）

一個擁有重兵而兼富才智的將領，他又結黨營私，聚斂財物，分金市恩，殘殺成性，加上家中還私藏軍火，其人行事的動機與目的當然值得推究。任何一個皇帝都會對這樣的臣工心生畏懼而預為防制的。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第二點。

清世宗本是一個嚴厲的君主，非常重視體統與法度的。雍正初年他在硃批中常對大臣有親暱戲謔的語句，雖然這是他駕馭大臣所使用的一種手段，但臣僚自身應該知禮守分，君臣間的禮儀應當作適當的保持才好。像鄂爾泰、田文鏡、李衛等人，對世宗的熱情批語都能保持冷靜，以致能保全始終，未曾遭難。年羹堯則與他們不同，也許他以椒房之親（年妹在康熙年間為世宗側室福晉），和世宗談些親人情話；也許是他因功得意，和天子作布衣之交了。可是語言文字之隙，常足以殺身而有餘，年羹堯在當時確實沒有領悟到這其中的道理。

雍正元年到二年之間，世宗對年羹堯常有滿口胡柴的硃批。像元年九月在年羹堯的「報秋成摺」上，世宗批道：「真正可喜之事。有你這樣封疆大臣，自然蒙上蒼如此之佑，但朕福薄，不能得如爾之十來人也，朕何可諭！」（註二一）這就顯係過分。在二年正月初二羹堯的「奏謝貂皮掛等物摺」中，皇帝又批：「實尚未酬爾之心勞功忠四字也。我君臣分中不必言此些！」這番話多少會令人有些肉麻（註二二）。至於世宗要羹堯互勉作為千古君臣榜樣，讓大家流涎欽慕一批，措詞更嫌失體（註二三），而世宗藉硃批和羹堯談些京中劉道人論人前生笑話的事，可以說是歷代官方文書中罕見的特例（註二四）。不過這是帝王的問題，在專制時代，他是可以為所欲為的。況且世宗慣用硃批作控制臣僚的工具（註二五）。羹堯却未注意這些，而被世宗

親暱的戲批所愚弄了，他竟也像皇帝一樣的寫些不成體統的奏章。雍正元年他爲刻印「陸宣公奏議」一書代世宗擬寫序文，而且公然呈進。我們知道：雍正帝是個喜用筆墨的君主，並且對自己的文章一向自負異常。羹堯未得世宗指示而竟然代撰序文，這當然不是世宗所喜的事（註二六）。雍正二年，皇帝賜了一些琺瑯器皿給羹堯，羹堯竟大言不慚的在奏謝文中用了：「更懇聖慈，如有新製琺瑯物件，賞賜一二，以滿臣之貪念……」的語句，世宗回批：「今將現有數件賜你，但你若不用此一『貪』字，一件也不給你。得此數物，皆此一字之力也！」（註二七）可見皇帝也特別指出了他的不敬之處，文字雖是以戲謔還以戲謔，但已極具警戒之意了。年羹堯也許以爲皇帝對他特殊，他們可以藉奏摺與硃批談些情話，開些玩笑。但「奏繳硃批諭旨，故匿原摺」，最後却成爲羹堯九十二大罪狀中的一款了。羹堯在得寵時沒有注意到這些，沒有想到這會是對君主無禮的手書證據！在世宗方面言，愛暱的硃批原來也許是攏絡羹堯的手法，而羹堯竟視爲真誠心意，把天子謬託爲知己了。他對世宗的不恭順態度既不能遽除，世宗怎能不對他發生厭惡之心？！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第三點。

年羹堯的顯赫一世，權重一時，實在並非自雍正時期才開始。早在康熙末年，他到熱河行宮陛見聖祖時，就已經有不少人「奔走於其住所，殷勢諂媚，接踵而至」了（註二八），可見羹堯在康熙之世，也就是世宗繼統之前，就有權勢與地位。然而羹堯不能虛懷克己，反因寵貴而增長了他的驕傲，加上若干小人的趨逢，種下日後敗亡的因子。在陝西服官期間，「文武各官與年羹堯稟啓用紅綾裱糊背面，或寫門生，或寫門下。提鎮亦寫卑職」（註二九），這些都足以使羹堯腐敗驕縱的。到平定西藏與青海軍功告成以後，他更是名滿天下，食侍講俸的錢名世作詩投贈給他，向他頌德稱功，清世宗後來目爲「諂媚姦惡」（註三〇），汪景祺這個人更是崇拜他至於瘋狂，稱讚羹堯是「宇宙第一偉人」，並且「不一瞻仰宇宙第一偉人，此身誠虛生於人世間」。他又確定羹堯的功業史無前人，如果以郭子儀，范仲淹等來和羹堯相比的話，真「不啻螢光之於日月，勺水之於滄溟」，都是微不足道的（註三一）。語云：驕奢必敗，滿必招損。羹堯在躊躇志滿的時候，行爲上也表現出太多的問題，激起世宗的憤怒而難於忍耐了。

年羹堯的九十二條大罪狀中有一條是：「偽造圖讖妖言」，另一條是「謀爲不軌」，這些都是屬於「大逆之罪」部分的（註三二）。現在看看羹堯平常的居官行事，實在可以使人相信這些罪狀並非全是空穴來風。雍正年間，年羹堯只是一個川陝總督，授有大將軍銜而已，無論如何，他對皇帝應該尊重的，更不能把自己比擬作皇帝。可是有些事實很令人訝異：像世宗的恩詔傳到陝西的時候，有兩次他不但宣讀，也不張掛，對皇帝竟藐視若此（註三三）。他給皇帝上奏摺時，只在內房中啓發，全不按規定辦理；實際上他應該穿上朝服在大堂中拜送才對（註三四）。世宗爲了慰勉他的勤勞，特別揀選了一批侍衛發送到年羹堯處；可是羹堯把他們當奴僕一樣使喚，根本蔑視皇恩（註三五）。凡此種種都足以說明羹堯對世宗的不敬。尤有進者，他「用鷺黃小刀荷包，擅穿四衩衣服」，而「衣服俱用黃色袷」；他的兒子也「穿四團補服」；公館牆壁「俱彩畫四爪龍」，轅門鼓廳也用四爪龍裝飾。「凡與屬員物件，令北向叩頭謝恩」，儼然帝王氣派（註三六）。雍正三年夏天，世宗藩邸舊人戴鐸從年羹堯處回到京城，在王大臣面前供稱年羹堯在西安的諸端劣蹟，其中有一項說到世宗曾賜「青天白日」匾給年羹堯的事，年羹堯竟然以天日居。戴鐸特別點醒他：「主子賜的匾青天白日乃係教公爺（指羹堯）高懸在上，時時如仰對青天白日，非以公爺爲天日也」（註三七）。年羹堯出身詞林，當然他不會不懂得天日二字的意義，而他竟以天日自擬，顯係僭妄之極。專制時代，「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年羹堯想以天日自居，當然就犯上了大逆之條。

年羹堯失寵以後，世宗爲使他遠離西陲根據地，特別調補他爲杭州將軍。羹堯當然想留駐西疆，繼續保持軍權，但勢不能也。他在雍正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勉强的上了一個「奏謝調補杭州將軍」的摺子，可是世宗却忍不住的先發制人了，皇帝批道：「朕聞得早有謠言云：『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戰場』之語，朕今用你此任，況你亦奏過浙省觀象之論，朕想你若自稱帝號，乃天定數也，朕亦難挽！」（註三八）可見年羹堯曾經對世宗說過這些「大逆不道」的話，世宗對這些傳言與羹堯的想法一直耿耿於懷，未曾稍釋。對於一個想「稱帝」的臣工來說，任何皇帝都不可能寬免他的，難怪世宗氣憤的說：「朕若負你，天誅地滅。你若負朕，不知上蒼如何發落你也！」「朕亦只得顧朕君道，而管不得你臣節也」。不過他很有感慨的說：「若

如此不過我君臣止於貽笑天下後世，作從前黨羽之暢心快事耳」。他在批寫這段話的時候，幾乎氣得「不能落筆」。其後不到一月，當年羹堯離開西安赴任杭州將軍的那天，他臨行時竟向世宗表示了他要在江南水陸分途的地方——儀徵——停下來，「靜候綸音」，不想直接去杭州的任所（註三九）。世宗雖然說他「逗留中途，曠廢職守，遷延觀望，不知何心？」（註四〇）但是年羹堯的存心可以說盡人皆知的。這種尾大不掉，心懷逆謀的行徑，又怎麼能不令世宗心生憎怒呢？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第四點。

綜合以上所論，我們似可了解：年羹堯與世宗之間既有舊怨在先，而他又恃功驕縱在後，世宗對他的不信任是在所難免的。羹堯以戰功與殘殺著稱，而又聚斂財物，植黨營私，定會令君上心膽震攝，內生懼畏。皇帝對他驕狂無禮與尾大不掉的態度當然會日久生厭，而羹堯的逆謀言動更足以觸發世宗的怒心。疑也、畏也、厭也、怒也，有此四者，羹堯還能不凶終嗎？年羹堯的死，我想也許可以從這裏得到一些解釋。

（本文係拙作「年羹堯研究」中之一章，寫作期間，承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獎助，謹此致謝。）

註釋

（註一）年羹堯的罪狀條款詳見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卷三九頁六下至一四上。至於年羹堯自己所說的一段話，懇求施恩的，則見於民國六十年故宮博物院出版的「年羹堯奏摺」專摺（下）第八五二頁。

（註二）近代清史專家如孟森、蕭一山、王鍾翰諸先生「在清代史」、「清代通史」和「清世宗寧嫡考實」、「清世宗入承大統考實」等書及專論中都作如此結論。

（註三）根據八旗通志等書的記載，年羹堯一家原屬漢軍鑲白旗，（見選舉表一二六）康熙間年羹堯妹妹嫁給雍親王為側室福晉，雍親王領鑲黃旗。故年家亦被抬旗撥入鑲黃，以示恩寵。「年羹堯奏摺」專輯（下）頁八一二「回奏孟光祖至川情形摺」中羹堯對聖祖說：「臣屬雍親王門下八載於茲」一語，此摺呈上於康熙五十六年五月，故知年家撥屬雍邸事在康熙四十八年。

（註四）雍親王賁胤年羹堯事見「雍親王致年羹堯書」。這封信是原件真蹟，原藏北京景陽宮書檔中，未註年月；不過文中提到允祉門下人孟光祖送禮的事，顯然這封信是寫成於康熙五十六、七年間。民國以來，自故宮博物院成立後，經專家整理刊印於「文獻叢編」卷首，民國五十三年，臺北台灣風出版社又重印發行，見重印本上冊圖像部分第一頁。孟光祖為誠親王允祉到各省活動事，年羹堯確是收受了饋贈，並由年羹

堯的家人親口說出。不過堯堯矢口否認，只強辯說：「果有親王所賞物件，臣已收受，即不奏明，應有謝啓；若直受而不稟謝，臣係旗人，雖至愚必不敢無禮至此。」「又何敢隱匿不報，自蹈欺誑之條」。後來經過刑部等衙門調查研議，認為年羹堯確有問題，應受革職的處分。聖祖爲安撫堯堯，並爲日後利用的餘地，從寬發落，給他一個「革職留任效力」的機會（事見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二七三頁二上及「年羹堯奏摺」專輯（下）頁八一二「回奏孟光祖至川情形摺」）。

（註五）清世宗雍正即位後之四年，在康熙末年和雍親王爲敵爭繼的允禩允禔二兄弟因結黨獲罪，在嚴懲黨人行動中，有一西洋人穆景遠（又作敬遠、經遠、金遠，原名爲 Joannes Mourao，葡萄牙人，一六八一年生，康熙三十九年來華，後召入宮中，會擔任聖祖翻譯多年，與大臣及皇子等頗多交接）被牽入案中，經鞫問嚴訊，穆景遠有口供乙紙，內中有「我原與年羹堯的哥哥年希堯相與，因此在年希堯家會過年羹堯。到康熙五十九年內年羹堯在口外時，我去望過他。到後來允禔寫了一個官員何圖的名字，叫我拿去到年羹堯處托他照看。我問他：『可要什麼西洋物件嗎？』年羹堯說：『我別的東西都不要，我只愛小荷包。』我就向允禔說了。允禔隨即叫我拿了一匣子小荷包有三四十個給年羹堯，年羹堯都留下了。我因向年羹堯說：『允禔像貌大有福氣，將來必定要做皇太子的；皇上看他也很重。』我原是贊揚他的好處，要年羹堯爲他的意思。」……由此可見：西洋人也幫助皇子們奔走遊說，而年羹堯確實和允禔有着相當密切的關係。（見「文獻叢編」穆景遠供詞）

（註六）允禔是聖祖康熙的第十四皇子，康熙五十七年十月十二日被任命爲撫遠大將軍，征討準噶爾。允禔當時的爵位是固山貝子，可是出征的大旗用正黃纛，邊親王之例。隨征的王、公等十六人，領兵近二十萬。聖祖又特在太和殿頒給允禔大將軍印；出發時諸王、貝勒、貝子、公等並二品以上大臣都送行，其儀禮莊嚴隆重若此，實在是清初所未見。康熙五十八年，聖祖又降諭畀允禔專征重任，遇章京護軍校缺出可以即以行授補，不必奏請（事見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二八二頁一〇下至一一上及卷二八四頁六上下等處）。因此當時京中都認爲允禔已是聖祖廢儲後的意屬繼承人選。允禔就公開的說過：「十四爺現今出兵，皇上看的也很重，將來這皇太子一定是他」（同前引穆景遠供詞）。年羹堯其時是四川總督兼巡撫，正在西征地區；聖祖又百般攬絡他，升官賜賞，兼而有之。因此年羹堯對允禔多方效力，處處迎逢（見「上諭內閣」雍正三年六月初七日上諭等條），好讓允禔邀譽西陲，建立地位。雍親王極爲不滿年羹堯的行爲，戴鐸也就向胤禩提出過警告說：「恐怕西邊十四爺與總督年羹堯有事」（見文獻叢編「戴鐸口供」、國風版頁一一一）。

（註七）見「上諭內閣」雍正七年十月初六日第二諭及清史稿卷二九九頁三下。

（註八）請參看拙作「清世宗繼統與年羹堯之關係考」（國立成功大學學報第十號）。

（註九）清世宗繼位以後，隨即對敵立的兄弟們採取行動，分解他們的勢力。如邀允禩任職中央，授爲總理事務四大臣之一，以牢籠人心，

又安反側；解除允禩軍權，並拘禁湯泉；遠徙允禔於西寧，着年羹堯等約束；這都是聖祖死後不到百日之間所發生的事。西寧在甘肅境，是年羹堯管制的地區，世宗叫他派專人監視允禔的行動。年羹堯雖向皇帝密報「凡貝子允禔有何行事之處，臣皆得聞之也」。但是有關的報告並不多，而且也不大壞，只說些「允禔近日行事光景，頗知收斂。……其上下人等亦自此始知畏法」。筆下顯見留情。實際上允禔自遠徙西寧以後，對世宗極為不滿，不但不知收斂，而且「氣概強盛，形色如前，並無懼畏之容。」同時在大同收買人心，以致「人俱稱賢王，普概感激」。不僅如此，允禔與年羹堯之間竟有「密封文書」往還，且有十數次之多。氣得世宗逼問羹堯：「你與允禔來往字跡，光景言辭怎麼樣？若有存留者，送些來看！」凡此種種，都可看出年羹堯對世宗的有貳心（以上各節見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卷一頁八至九頁十上；卷二頁十七下，二六下；卷四頁九下，二〇下；卷六頁三下；卷二九頁四二下、四下。「年羹堯奏摺」專輯頁八五三、八七三及「文獻叢編」（上）頁七「李紱奏報查出年羹堯與塞思里（允禔）往來密書摺」等處記載）。

（註一〇）「年羹堯奏摺」專輯（下）第一〇八三頁：李如柏參年羹堯摺。

（註一一）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卷三十一頁二七下有世宗諭旨一道，文中說：「……督撫並無跪接大將軍之例，伊（按指年羹堯）去年來京陛見，又未帶有大將軍敕印，而途中令總督李維鈞、巡撫范時捷跪接。伊係征剿青海將軍，青海之叛逆王台吉等，則可令其下跪，至並無罪犯蒙古王等，亦令下跪。阿寶係扎薩克郡王，本朝之額駙，亦竟令其下跪，伊如此僭越無知，是誠何心？」

（註一二）范時捷在參年羹堯的奏摺裏說：「將軍督撫係朝廷大臣，自王以下俱係平行。先時圖海為大將軍與督撫往來，俱用咨文。年羹堯職掌大將軍，妄襲允禔之例，與將軍督撫，擅用令諭，書官書名，妄自尊大，蔑視官常，有衙門行文可證。」（見「年羹堯奏摺」專輯（下）頁九〇四）。世宗藩邸舊人戴鐸在雍正三年間有口供兩通，其一文中有：「他（按指年羹堯）行文與督撫大人，封皮俱直書名字，用硃筆打直，已經僭妄。即如將軍傳單安，乃滿洲中之好大人，又加大學士，將相一體，而封皮上公然直書名字，此即其僭妄無禮之處也。他在西安，同城大人俱不許打鑼放炮。奴才進見，俱令在地下坐。奴才年近四旬，除了我主子跟前，從未在地下坐。他公然在炕上坐，以奴隸待人。不但奴才壞了的布政司，即現任一切屬官，俱是如此；此即其驕縱自恃也。……」（見「文獻叢編」臺北國風版頁一一〇）。

（註一三）故宮珍藏李如柏奏摺原件有：「……延安府所屬之米脂等處，招回逃荒之民，蠲免惟正之供，勿令失所者，皇上特賜之恩，年羹堯則出示以曉諭衆夫曰：此本爵之力。告示中並不言皇上之恩，此臣與榆林道朱曙孫同目見者也。彼時臣甚異年羹堯市恩於衆，不知意欲何為：……」（見「年羹堯奏摺」專輯「下」頁九九四）。

（註一四）雍正三年三月十九日福建福寧鎮總兵官顏光祚曾向世宗奏稱：「……臣前聞年羹堯在西寧時，其尊榮權勢，中外無與比倫。出入以

士塾街，以水壓壓。其巡撫提督等官，名雖平行，實同屬下。……」（見「年羹堯奏摺」專輯「下」頁八九一）。後來年羹堯罪狀九十二條中有「出門黃土填道，官員穿補服淨街」一款，當即指此。

（註一五）梁章鉅「歸田瑣記」中有「小炒肉」一條。據說：「年羹堯由大將軍貶為杭州將軍，後姬妾皆星散。有杭州秀才適得其姬，聞係年府專司飲饌者。自云：『但專管小炒肉一味。凡將軍一飯，必於前一月呈進食單，若點到小炒肉，則我須忙得半日，但數月不過一二次。他手所不能辦，他事亦不相關也。』」秀才曰：『何不為我試之？』姬哂曰：『酸秀才談何容易！府中一盤肉，須一隻肥豬，任我擇其最精處一塊，用之。今君家每市肉率以斤計，從何下手？』秀才為之嗒然。」（見清代小說筆記選乙集頁七七三，江奮經編，商務版）這一傳說也許略嫌誇張，但年羹堯之奢侈與作威福由此也可見一斑。

（註一六）年羹堯自從在康熙四十八年任職四川巡撫以後，對西疆開拓的事業實在有不少貢獻。例如康熙五十六年討平越嶲衛屬番與普雄土千戶叛亂時，他親赴松潘協理西藏軍亂，可見他真是實心任事。康熙五十七年他奏請自打箭爐至裏塘增設驛站，增駐防軍等等，確實都是籌劃邊防的良策。後來他又用「以番攻番」的策略制服了青海郭羅克番，更現表了他的軍事天才。允禩受命撫遠大將軍，以「收復藏地」為口號西征，羹堯在他麾下出力良多。康熙五十八年，他精修武備，擬定四路進剿計劃，準備給虐擾西藏的策妄阿布坦以痛擊。他又向聖祖提出平息西藏爭端的建議：「臣又聞拉藏之為藏王，苦累人民，失其衆心，賊人因此取得其國，而用其民。西海諸王皆古什汗子孫，以其故地，不無覬覦。若聖主選封一人為藏王，使領兵同進，則彼自為戰，亦制勝之權宜。……」（見「年羹堯奏摺」專輯八二六「預備進藏兵數摺」）這件事聖祖當時未作決定，後來允禩傳集青海的蒙古王公台吉等會議，決定送新胡必勒漢進藏為達賴，而新胡必勒漢是青海人中被選封的藏王，可見這是年羹堯主張的實行。此外在這次清兵籌劃進藏期間，年羹堯還悉心的探聽有關西藏的各項消息，如班禪喇嘛的生死，拉藏汗的印信下落，策妄潛入西藏與喇嘛們密談事，大軍進剿路途等問題，無一不在他搜求之列（見「年羹堯奏摺」專輯頁八二六至八二七）。據此可知：盛清平藏之役，年羹堯確有貢獻，其軍事天才亦可由此行動中窺知。

（註一七）平定西藏之役，青海很多王公都參加了，事後世宗雖敘功獎賞；但青海諸部落領袖間又起爭端，發生了著名的羅卜藏丹津反清事件。清廷招降不果，乃有任命年羹堯為撫遠大將軍專征之事。羹堯於是貯備軍糧、精煉火器、增購駝馬、佈置邊兵，分四路出師，結果戰無不勝，「殺賊甚衆，獲械無算」（見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卷一二頁二七下；卷一三頁一八上；卷一四頁一三上等處）。可是在征伐羅卜藏丹津的歷次戰役中，羹堯發現青海等地的喇嘛同情並支持羅卜藏丹津，甚至還有不少的參加作戰反清，這是叛亂不能很快平服的最大原因。後來年羹堯用了高壓手段，殘殺番僧，在西寧喇嘛寺一役，不分奸良，一次誅戮了四五千個喇嘛（見「年羹堯奏摺」專輯「下」頁九五二）。同時也焚燬寺廟，使

羅卜藏丹津失去根據，戰局從此急轉，不久亂平，年羹堯也被封爲一等公。爲了開拓邊疆，平息亂源，年羹堯後來又提出防邊八款及青海善後事宜十三條，都是相當澈底而有效的策略。

（註一八）雍正三年六月十三日署陝西按察司事監察御史許容說：「……查現在文官司道以下，州縣以上；武官副將以下，遊擊以上，多係前督臣年羹堯就近題補，未經引見。……再查年羹堯參劾各官，或情罪允當，或事有可原，或任意喜怒，聽信讒言，多非本於至公。……」同年七月初八日李如柏也奏稱：「……年羹堯之舉劾，苟非門生故舊，依附於彼者，縱令材能出衆，必設法以參劾之，不去其官守不已。若係依附於彼者，縱劣跡昭彰，必巧爲曲護，越次以保題之，使深受其恩，始終不忘。……」（見「年羹堯奏摺」專輯「下」頁九四七、八八二等處）。

（註一九）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卷三九頁九下記羹堯貪贖罪十八款極詳，可參閱。有關搶劫喇嘛寺財物事，「年羹堯奏摺」專輯頁一〇〇四馬煥奏摺中稱：「……臣密訪得年羹堯于雍正元年十月內，派撥西軍總兵黃喜林剿滅郭莽寺，黃喜林將寺內喇嘛盡行殺戮，所得金佛、貂皮、元狐、珠寶、金銀、綉緞等物共四十餘車，稟夜運交年羹堯管帳巡捕官典史胡顯家人魏之耀收訖。又派四川巡撫王景灝、寧夏總兵王嵩，抄殺白塔寺以及爾格楞寺收其金銀珠寶，不知其數。」另外同書專輯頁九五一至九六〇有岳鍾琪奏報乙件，內稱雍正二年正月初九日年羹堯面令岳鍾琪領兵會剿格隆寺喇嘛。十三日岳等率獲喇嘛數名，公同詢問之下，據供稱：「我等寺院喇嘛，自羅卜藏丹津一有反信，我等就在大將軍處投過誠的。我們坐床的大喇嘛丹嗎胡圖克免往西軍去見大將軍，被大將軍留住西軍，未遣回寺。後西軍喇嘛衛人來寺，要我們捐銀一萬兩，我們如數交了。又過了兩日，差人又來說一兩萬還少，要湊足兩萬兩才好。我們衆人相商，銀子漸漸多了，一時又湊不足數，若遲了也是死，莫如反了罷，所以才反了。」等語。……「十七日到寧，臣進見年羹堯，回覆將令，隨將緊要喇嘛據供起霧緣由之事，當同衆人一一告懇，年羹堯惟面紅無語，且並不吩咐追究。臣方覺非聽衛妄行，乃有所主使耳！」可見年羹堯之貪贖情形其及手段之卑劣。

（註二〇）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卷三九頁七上。

（註二一）「年羹堯奏摺」專輯「下」頁八四八。

（註二二）同上頁八五五。

（註二三）雍正二年三月十八日年羹堯有「奏謝自鳴表摺」，世宗硃批爲：「……從來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爾之慶幸，固不必言矣，朕之欣喜，亦莫可比倫。總之我二人做個千古君臣知遇榜樣，令天下後世欽慕流涎就是矣！朕實實心暢神怡，感天地神明賜佑之至。」（「年羹堯奏摺」專輯「下」頁八五七）。

（註二四）雍正二年七月初二日年羹堯上「謝賜珪璋鼻烟壺摺」，世宗硃語甚長，在談及怡親王允祥身體健康等情形後，皇帝另寫道：「還

有笑話，京中有一姓劉的道人，久有名的，說他幾百歲壽不可考。前者怡王見他，此人慣言人之前生。他說怡王前世是個道士，朕大笑，說這是你們前生的緣法，應如是也。但只是爲什麼商量來與我和尚出力？王未能答。朕說：不是這樣，真佛真仙真聖人，不過是大家來爲利益衆生，栽培自己福田，那裏在色像上着脚。若是力量差些的，還得去做和尚，當道士，各立門庭才使得。大家大笑一回，閑寫來令你一笑。」（「年羹堯奏摺」專輯「下」頁八六〇）

（註二五）請參閱拙作「雍正硃批諺旨——控制臣僚的一種工具」（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四卷二期）。

（註二六）「年羹堯奏摺」專輯「下」頁八五〇載年羹堯原摺一件，未記日期。世宗在年摺「伏念萬幾無暇，恭勸節勞頤養，何敢以此（按指寫序）上煩聖心，不揣固陋，代擬一序……」等句旁批道：「少有不合朕意處朕自然說給你。」「得暇好好寫來賞你，定不得日期」，可見世宗不甚熱心。

（註二七）同上專輯「下」頁八五六「奏謝瑤瑯双眼翎摺」。

（註二八）「年羹堯奏摺」專輯「下」頁一〇八〇。

（註二九）同上頁一〇八一。

（註三〇）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卷四二頁二〇上壬戌條：「大學士九卿等奏食侍講俸之錢名世，作詩投贈年羹堯，稱功頌德，備極諂媚；且以平藏之功，歸美年羹堯，謂當立碑於聖祖仁皇帝平藏碑之後，甚屬悖逆，應革職，交與刑部從重治罪。得旨：向來如錢名世，何焯，陳夢雷等，皆頗有文名，可惜行止不端，立身卑污，所以聖祖仁皇帝擯斥不用，置之閒散之地，而錢名世諂媚性成，作爲詩詞，頌揚姦惡，措詞悖謬，自取罪戾，今既敗露，益足以彰聖祖知人之明。但其所犯，尚不至於死，伊既以文詞諂媚姦惡，爲名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詞爲國法，示人臣之炯戒。著將錢名世革去職銜，發回原籍，朕書「名教罪人」四字，令該地方官製造匾額，張掛錢名世所居之宅。……」

（註三一）汪景祺：西征隨筆頁二〇至二一（臺北國風出版社重印本頁一二三至一二四「上撫遠大將軍太保一等公川陝總督年公書」）。

（註三二）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卷三九頁六至七。

（註三三）同上同卷頁八下。

（註三四）同上狂悖罪第三款。

（註三五）「年羹堯奏摺」專輯「下」頁九三六有世宗雍正三年五月十七日聖旨內載：「……至於前歲朕揀發與年羹堯之侍衛，俱係皇考時所用，在朕左右隨侍之人，特欲伊等効力軍前，黽勉勤勞，並非令爲年羹堯厮役，而供其驅使也。伊等至彼，貪其資財，爲年羹堯前引後隨，且爲

鑒證，竟以奴僕聽命而行。……」侍衛等雖因貪財而供羹堯趨使，但羹堯應以皇恩爲重，對其待遇應有分寸爲宜。

（註三六）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卷三九頁八上。

（註三七）戴鐸原是世宗藩邸舊人，雍正元年因事被發與年羹堯軍前効力，他在西安住了兩年，到三年夏初才回京「復命」。據戴鐸向王大臣等供稱「……奴才於元年八月二十九日到西安。於九月中年羹堯即往軍前去了，年羹堯於雍正二年六月回西安……他的屬官都是每日兩三次早晚刻刻去見，奴才是効力的人，不過隔十來日一上衙門。……八月中，曾送過他一本『照心錄』，是奴才閒住在寓，將古人的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家常俗事集成，寫一部書，內中俱係古人的格言成語，集成寫了一部，書名曰：照心錄。書前面作了一篇序，序中間有人生在世所共仰望者天與日。天豈雲之所能掩耶？日豈霧之所能障耶幾句。年羹堯曾說奴才：『主子賜我的匾乃青天白日，你爲何這序上用天日的話呢？』」奴才回：『主子賜的匾青天白日乃係教公爺高懸在上，時時如仰對青天白日，非以公爺爲天日也。』他這一次見奴才甚惱。……」（『文獻叢編』：戴鐸口供、國風版頁一一〇）可見羹堯以天日自擬。汪景祺『西征隨筆』中也稱讚年羹堯「朝廷深賴佐賢，天下共仰純臣。朗若青天，皎如白日。夫是以宸翰寵賁，天子倚閣下等山嶽之重也（小註云：上賜公御書曰青天白日）。今閣下勳名如此其大，功業如此其隆，振旅將旋，凱歌競奏。當吾世而不一瞻仰宇宙之第一偉人，此身誠虛生於人世間耳！」（見上撫遠大將軍太保一等公川陝總督年公書）豈非羹堯想做「宇宙第一偉人」而自擬天日？

（註三八）『年羹堯奏摺』專輯「下」頁八七四。

（註三九）同上同頁「奏於饒正縣靜候綸音摺」中年羹堯稱：「……臣之負罪如山，萬死莫贖，既不敢久羈陝省，亦不敢遽赴浙江。……臣於雍正三年五月十七日起程前至饒正縣，靜候綸音。」

（註四〇）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卷三三頁九上至十下。